

美國史學家對傑克遜民主的解釋之演變

孫 同 勛

(一) 前 言

美國歷史上有幾個時期引起史學家長期而激烈的爭論。傑克遜時代¹ 是其中之一。有關這一時代的作品真可說是汗牛充棟，而所提出的意見就細節而言更是千變萬化，莫衷一是。造成這種情形自然有其原因。一八二〇與一八三〇年代是美國史上的一個轉型期。在政治方面，一般人民對政治的影響正隨着參政權的擴大與總統候選人提名制度的改善而增加，原來共和與聯邦兩黨對立的局面早已瓦解，Richard P. McCormick稱之為美國第二政黨體系 (the Second American Party System) 正在形成之中。²在經濟方面，交通大為發達，工廠制度廣為引進，工業化正加速進行，美國經濟已超越起飛階段而繼續成長。在社會方面，人口的西移，在初拓的邊疆上出現自由小農；而工業化的進行不但使美國城市化而且也造成都市中的工人階級。新人爭求上升，而舊有的領導階層或被取代。客觀環境正在日新月異，但舊價值、舊觀念與舊習慣却仍在左右人們的思想行為。在此迅速改變、新舊交替的時代，處處充滿了矛盾與對立，因此而有種種改革運動，企圖使美國更和諧、更美好。總之，傑克遜時代確是一個千變萬化令人難以捉摸的時代。

象徵這一時代的人物傑克遜也同樣充滿傳奇與矛盾。他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但後來却擠身入西南地區的莊園主貴族階層。他自己沒有進過學校，但後來却作過老師，當過律師與法官，擔任過國會議員。他曾未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但却成為全國崇拜的軍事英雄。不但他的一生充滿傳奇，他的為人更可說是矛盾的化身。據一位給他寫傳的

1. 「傑克遜時代」(the Jacksonian Age) 通常是指自一八二八年傑克遜(Andrew Jackson)當選為美國總統到他的繼承人范布倫(Martin van Buren)在一八四一年總統任期屆滿的十二年而言的。但有時也被廣義的用來泛指一八二〇年代後期到一八五〇年代的一段時間；或狹義的指稱傑克遜擔任總統的八年(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七)。這一段時期名稱也很多，除「傑克遜時代」外，有時也被稱為「傑克遜民主(the Jacksonian Democracy)」，「平民時代(the Age of the Common Man)」，「工人覺醒的時代(the Age of the Workers' Awakening)」或「解放的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Liberated Capitalism)」等。見 Frank Otto Gatell, "The Jacksonian Era, 1824-1848," in William H. Cartwright and Richard L. Watso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Washington, 1973), p. 309.

2. Richard P. McCormick, *The Second American Party System: Party Formation in the Jacksonian Era* (Chapel Hill, N.C., 1966).

人說，傑克遜是「一位愛國者與賣國賊。他是一位偉大的將軍，但對戰爭的藝術却一無所知。他是一位寫作高雅流暢光彩的作者，但却不能寫一個正確的句子與拼對一個四個音節的單字。他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却曾未計畫任何一個方案。他是一個最坦誠率直的人，但却也最善作偽。一個藐視法律與最遵守法律的公民。一個堅守紀律的人，但也會毫不猶豫的不服從長官。一個民主的貴族。一個溫文儒雅的野蠻人。一個兇暴殘忍的聖者。」³

這樣的時代與這樣的人自然最易引起人們不同的意見與反應。爭論也就難以避免。但是傑克遜時代之所以造成爭論不單純是因為他的為人以及他所象徵的那個時代令人難以捉摸。尤其重要的是歷史研究的特性往往使歷史學者對同一事件持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時有異見無寧是極為自然的事。而影響歷史解釋改變的原因不止一端。新史料的發現，新研究方法的採用，新觀點的嘗試，研究成果的累積，甚至研究者個人的偏見等等都可能造成舊意見的被修正或揚棄，新解釋的出現。但是當同一個時代的主要史學家對同一個歷史現象不約而同的提出類似的解釋時，這種現象顯然就不是以上所舉的任何原因所能說明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時代流行思潮影響了該一時代史家的看法。換言之，即同一時代的史學家在無形中吸收了他們所生存的那個時代的流行思潮或偏見，成為他們自己思想體系的一部份。當他們都從此或多或少相同的觀點或立場去看過去的事件時，當然會得到相同的結論。從此而言，時代流行思潮不但影響歷史解釋，而且是影響歷史解釋的許多原因中的最主要的一個。而時代思潮變動不居，代有不同，所以有關同一史事的解釋也就代有改變了。⁴

這種情形在美國似乎更為明顯。美國的史學史家如 John Higham, Irvin Unger, Robert Allen Skotheim 等人在其有關美國史學史的研究中都特別強調時代流行思潮與歷史解釋之間的關係。⁵ 如果就實際的歷史研究而論，美國的史學解釋至少已經歷了四次改變。此即流行於十九世紀後期的惠格派史學 (the Whig historiography)，二十

3. James Parton, *Life of Andrew Jackson* (3 vols., New York, 1861), I, vii. 這是第一本有關傑克遜的傳記，現已不易見到。引文係轉引自 Charles Grier Sellers, Jr., "Andrew Jackson Versus the Historians," i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LIV (March, 1958), 615.

4. 有關時代流行思潮對歷史研究的影響，請參考 Robert Allen Skotheim, ed., *The Historian and the Climate of Opinion* (Reading, Mass., 1969), "Introduction", pp. 1-5, 與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收在氏著《歷史與思想》（臺北，民國65年），頁247-270。

5. John Higham, "The Cult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Homogenizing Our History," *Commentary*, XXVII (Feb., 1959), 95-100; 與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N.J., 1965), pp. 89-232; Irvin Unger, "The New Left and American History: Some Recent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II (July, 1967), 1237-1263; Robert Allen Skotheim, *The Historian and the Climate of Opinion* 及其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Princeton, 1966).

世紀最初四十餘年的進步派史學 (the 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新保守史學或諧和派史學 (the Neo-conservative or Consensus historiography)，以及崛起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的新左派史學 (the New-left historiography)。而每一學派的崛起、流行與衰落都與其所處時代流行思潮的興衰息息相關。大致言之，惠格派史家多為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業餘史家，其時正是經濟迅速發展，改革風起雲湧的時候；放任的資本主義、改革思想與南北團結的主張在當時大為流行。其時的主要史學家大都從這些觀點來解釋美國的歷史。二十世紀開始以後，美國出現了全國性的進步改革運動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試圖擴大美國的民主平等與自由。一些出身西部親身經歷過農民所遭困窘與不滿情緒的年青史學家也感染了這種改革風潮而企圖把歷史研究轉變為促進改革的工具，因此他們把整個美國歷史視為一連續的改革過程。改革的推動力量是兩個對立集團——或是西部對東部，或是小農與工人對資本家，或是西部欠債的小農對東部放債的資本家——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造成革命性的巨變。透過這些巨變，美國就不斷的向較大的民主自由演進。這一進步史學的解釋主宰了美國史學研究達四十餘年之久。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國際與國內情形的變化，美國的一般思潮由戰前的樂觀進取轉向悲觀保守。這種新思潮反映於歷史研究便是新保守史學的崛起。新保守史學家一反進步史學家衝突進步論，轉而強調美國基本價值、制度與意見的延續不變性與諧和一致性。他們既否認美國史上曾有革命性的巨變，也不承認有任何地區或階級的對立與衝突。所以他們有時也被稱為「諧和史家」。過份強調持續與和諧就難免對現狀持有一種滿足的心理。這種滿足於現狀的心理到一九六〇年代的中期就被一批激進的改革份子痛加貶斥，認為有礙改革的努力，勢非消除不可。所以隨着一九六〇年代激進改革思潮的崛起，美國的歷史解釋也向左偏。激進的年輕史學家都從馬克斯的立場對他們的前輩史家發出猛烈的批評，在批評中他們逐漸發展出一種對美國史的新看法。因為他們都坦白的承認美國歷史上有貧富階級的對立與衝突，所以這一輩年輕的激進史家被稱為新左派史家。新左派史學崛起於一九六〇年代之中，到一九七〇年代開始衰退。因存在時間不長，對美國史學研究的影響不著。⁶

所以，美國史學解釋常隨時代思潮而變，而每一時代都有其獨特的看法。有關傑克遜民主的史學解釋或可為此提供另一個最好的例證。以下即從史學解釋與時代思潮的關係略論傑克遜民主史學解釋的演變。但因惠格派史學與進步派史學論者已多，學者大都耳熟能詳；而新保守派史家的解釋不但變化較多，且論者較少，故下文所論，前兩派較略

6. 有關美國史學派別的崛起背景，主要的主張，以及對美國史的主要解釋，請參考孫同助，「二十世紀的美國史學」，美國研究，第一期（民國60年3月），頁1-24；Tung-hsun Sun, *Historians and the Abolition Movement* (Taipei, 1974)；以及註5所列各文。

，後一派較詳。

(二)惠格派史家的解釋

有關傑克遜的歷史研究始自一八六一年。在那一年被譽為美國「現代傳記之父」的 James Parton 出版了他所寫的傑克遜傳。⁷ 作者在這本書裏所表示的意見大致上確立了其後四十年間美國史學家對傑克遜評價的基調。⁸ 其後的史家如多部頭通史作者 Hermann E. von Holst, James Schouler, 以及傑克遜另一位傳記作者 William Graham Sumner 等人都像 Parton 一樣對傑克遜的為人與施政持有批評的態度。他們有時不得不承認傑克遜有些長處，如 Parton 就很欣賞傑克遜行事有力的作風，而 Sumner 對傑克遜從貧窮中崛起的奮鬥大加讚揚。有時他們對傑克遜的若干政策也表示贊同。如他們都讚揚他在南卡洛琳那州撤銷國會法案危機 (The Nullification Crisis) 中所採取的強硬立場。⁹ 他們也都同意他終止第二國家銀行的作法。Sumner 更承認傑克遜的施政曾阻止了一些不良傾向的繼續發展，以及助長了一些良好的傾向。雖然有這些讓步，但是基本上，上述的史家們對傑克遜本人與他的大部政策都深具反感。¹⁰ 如 von Holst 宣稱傑克遜是一個「桀驁不馴的將軍」，他的「思想之未經訓練正如他的情感之未經約束一樣」；他易於為人操縱，「像在熟練的手中的軟臘」。Sumner 則認為他是「一個野蠻人 (a barbarian)」。他的行動都發自「仇恨、憤怒、直覺、偏見或情緒 (emotion)」。Schouler 直接了當的宣稱傑克遜「愚昧無知」。Parton 則謂傑克遜的無知、好意與熱情結合起來使他在所有人中成為最不適合總統職位的人。¹¹ 這些史學家都一致認為傑克遜是一個愚昧無知，未受過教育，不通世情，衝動易怒而權力欲特強的人。他們之不高

7. James Parton, *Life of Andrew Jackson* (3 vols., New York, 1861).

8. Sellers, "Andrew Jackson Versus the Historians", i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LIV (March, 1958), 615-616; Gatell, "The Jacksonian Era, 1824-1848," in Cartwright and Watso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p. 309; 以及 Gerald N. Grob and George Athan Billias, ed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1967), Chapter 7, "Jacksonian Democracy: Fact or Fiction?" pp. 225-239, 都持有這種看法。

9. 一八二八年與一八三二年國會連續通過高關稅法案。一向反對保護關稅的南卡州在一八三二年十一月召開的州民代表大會宣稱這兩個法案都違憲無效。傑克遜總統大表不滿，認為各州無權決定國會法案是否違憲。他公開宣佈做為美國總統他除了執行聯邦法律之外，別無選擇。南卡州也不肯讓步。實則雙方都不願決裂。最後由 Henry Clay 提出一折中的關稅法案，而使危機安然度過。此即所謂的 The Nullification Crisis。

10. 本節中所討論的史學家有些距今已超過百年之久，其餘距今也接近百年，因此他們的作品在國內搜閱極為困難。本節所論主要係根據註 8 所列各文以及 Donald B. Cole, "Honoring Andrew Jackson Before All Other Living Men," *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3, No. 3 (Sept., 1985), p. 359 寫成。

11. 以上各引皆轉引自 Sellers, "Andrew Jackson Versus the Historians", i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LIV (March, 1958), p. 616.

歡傑克遜是至為明顯的。

十九世紀後期的史家對傑克遜個人雖有不滿，但這還不是他們指斥他的唯一原因。除此之外，他們對傑克遜的若干政策以及他所代表的趨勢尤感不滿。據 Higham 說，十九世紀之末的業餘史家都屬於「貴族傳統」(the patrician tradition)；¹² 而 Charles H. Peck 則謂從傑克遜時代到十九世紀之末的美國史學著作一直為一些受過惠格式文化 (the Whiggish culture) 教育的人所控制。¹³ 他們之所以屬於貴族傳統是因為他們都來自東部或歐洲的中產或中產以上的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繼承東部高級文化所孕育出來的那種高雅的氣質，與優良的文藝修養。總之，他們是屬於上流社會的高貴紳士。他們之所以是惠格式的 (Whiggish) 那是因為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他們都是經濟自由主義者與保守的改革份子 (conservative reformers)。¹⁴ 所以 Sellers 認為十九世紀後半期美國的史學實際上是「貴族自由主義 (patrician liberalism)」的一個方面。¹⁵ 而此貴族自由主義有三個特點注定使這些貴族史家們敵視傑克遜民主。特點之一是他們都是改革份子。十九世紀後半期是美國民主最不光彩的時期，黨棍操縱選舉，政府為大企業大資本家服務。貴族改革份子所想改革的就是要消滅黨棍主義 (bossism)，打倒政府與企業的聯合，改良文官制度，以使真正的紳士能為民服務。他們認為黨棍的專斷選舉，官吏的腐敗無能都是由傑克遜引進的分肥制度 (the spoil system) 所造成的。這一個制度演變的結果使正直有為的人無法為人民服務。政黨與政府都為一些忠誠但卻無能無德的黨棍所把持。他們因為憎恨這種現象，就將一切罪惡歸之於始作俑者的傑克遜身上。所以 Parton 說：「如果他的其他公共作為都是聰明與正當的話，即此唯一的一個措施〔指 the spoil system〕也將足以使他的政府變得可悲可憫」。¹⁶ 第二個特點是他們都是矍鑠高貴的紳士，有學問有修養有聲譽有地位。他們也都熱愛民主與自由。但是他們所愛的民主與自由却是有秩序的，由紳士們領導主持的。這一特質使他們對傑克遜所代表的那種民主難以容忍。在他們看起來，出身於邊地的傑克遜與他的支持者都是些粗鄙不文的野蠻人，由他們參與政權使美國的民主墮落為暴民政治與煽動家操縱的政治，阻止了真正民主自由的發展。所以 von Holst 說隨着傑克遜的當選，

12. Higham, *History*, p. 151.

13. Charles H. Peck, *The Jacksonian Epoch* (New York, 1899), p. 328.

14. Gatell, "the Jacksonian Era, 1824-1848", in Cartwright and Watso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p. 309; Grob and Billia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 I, 226.

15. Sellers, "Andrew Jackson Versus the Historians," i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LIV (March, 1958), 618.

16. 轉引自 Gatell, "The Jacksonian Era, 1824-1848," in Cartwright and Watso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p. 310.

美國政治開始走下坡路，使「羣衆的情緒與意志代替了更有效能的人士所提供的有組織有紀律的領導」。¹⁷他歸結說「人民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是一種「令人可怕的狀況」。Schouler則謂美國的民主常在「不知不覺中滑回到那一千百萬人曾經超脫過的泥淖，太容易成為罪惡與無知的犧牲品」。他進一步指出自從傑克遜以後，在煽動的手段下，低級的政客甚至無聊的政客與毛賊都參與了領導，而真正的政治家與高級政客反被擠出領導圈。其結果正如Parton所謂的「用以執行美國公共事務的愚蠢曾引起人們的驚奇」。¹⁸因此，在Parton, von Holst, Schouler, Sumner 這一批貴族史學家看起來，傑克遜入主白宮所代表的不是進步，而是政治、政府甚至整個文化的鄙俗化與墮落。

但是，不管他們對傑克遜持有何種看法，他們的看法大部份決定於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流行思潮。他們讚揚傑克遜對南卡州撤銷危機的處理，那是因為傑克遜堅持聯邦的完整性正符合當時人們及他們自己所強調的全國統一團結的主張。他們之讚揚傑克遜對國家銀行的處理，那是因為十九世紀後期正是自由放任主義大為流行的時間。他們之攻擊傑克遜採用分肥制度，那是因為消滅黨棍，改善文官制度正是當時最時髦的改革主張。由此而言，十九世紀後期業餘史家對傑克遜時代之看法顯然深受當時流行思潮的影響，也清楚的反映了當時流行的偏見。

(三)進步派史家的解釋

十九世紀的惠格派史家無人將民主與傑克遜聯在一起。他們即使討論到一八三〇年代的政治發展，也大都認為傑克遜的崛起所代表的不是民主的擴大而是民主的墮落與鄙俗化，其影響是反面的。扭轉這一論調，給予傑克遜影響以正面的評價，使傑克遜的名字與民主結合在一起，那是在二十世紀開始前後，一輩來自西部與南方的年輕史學家決心以歷史研究來促進民主發展以後的事。據 Edwin C. Rozwenc 的研究，首先將傑克遜與民主一詞聯在一起的是 Woodrow Wilson。他的大著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在一九〇一年出版。他將書中敘述傑克遜任職總統時期的首章稱之為「民主革命」(“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其後在一九〇六年 William McDonald 將他有關傑克遜時代的研究稱為傑克遜民主 (Jacksonian Democracy)。從此以後，傑克遜民主就成為進步史學家用來指稱傑克遜時代的通用語。¹⁹

17. 轉引自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United States, 1830-1850: The Nation and Its Sections* (New York, 1935), p. 26.

18. 以上各引皆轉引自 Sellers, "Andrew Jackson Versus the Historians," i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LIV (March, 1958), 617-618.

19. Edwin C. Rozwenc, ed., *The Meaning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Lexington, Mass., 1963), "Introduction," p. v.

進步史學家之所以將傑克遜與民主聯在一起，那自是因為他們認為傑克遜的崛起與當政的確推動了美國民主的發展。這個看法與他們的前輩們的看法可說是大相逕庭。何以會有這樣的改變？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時代思潮變了，史家的看法也跟着變了。二十世紀初年，進步改革運動風起雲湧，席捲全國。許多出身於西部農村與南方的年輕人如 James Harvey Robinson,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Woodrow Wilson, Charles A. Beard, Vernon L. Parrington 都直接或間接的被捲入此一全國性的改革運動，而企圖為進步運動建立歷史基礎，以助長改革的努力。他們的這一企圖使他們對美國歷史的發展持有一特殊的看法。此即美國的歷史是透過兩個對立團體——或西部對東部，或小農對大資本家，或西部小農對東部大財閥——之間一連串衝突而向較大的民主與自由演進。²⁰ 這個普遍的解釋架構確定了他們對傑克遜民主的解釋。

傑克遜的形像由邊疆野人變為民主鬥士，在 William McDonald 的書中已有蹤跡可尋。McDonald 雖然對傑克遜本人以及他的若干政策仍持有保留的態度，但他却毫不猶豫的承認傑克遜的崛起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發展大有貢獻。他指出不管美國貴族的命運如何，美國的前途掌握在一般人民手中；而傑克遜對美國民主最大的貢獻在於他是第一位總統給與美國一般人民一個參與政權的機會。因此，在一八二五年到一八四〇年間的民主革命中，傑克遜一直被公認為是可以信賴的領袖。McDonald 明顯的認為一八三〇年代的民主發展是由傑克遜領導完成的。但因為傑克遜來自西部，是西部思想情感的化身，因此美國民主的特性必須透過傑克遜及其代表的西部才能清楚的了解。²¹ 於此可見，McDonald 不但正式將傑克遜和民主聯在一起，而且也認為西部邊地所孕育出來的民主透過傑克遜而對全國的民主演進發生影響。就承認西部的存在與影響而言，McDonald 可能受到 Turner 邊疆論 (the frontier theory) 的影響。但是這一影響顯然並不徹底，因為 McDonald 還沒有提到區間的對立與衝突。

首先從區間的對立與衝突來解釋美國歷史發展的是 Turner。他的邊疆論已廣為人知。人們較少知道的是他由邊疆論發展出來的區域論 (sectionalism)。由於西部邊疆的開拓與定居，到一八三〇年代就在俄亥俄谷地 (the Ohio Valley) 與密西西比谷地 (the Mississippi Valley) 出現一個新的定居區域，與舊有的新英格蘭，大西洋中部地區，大西洋南部地區相對峙。這四個地區在經濟、社會與思想、生活習慣方面都不相同，因此政治要求也不一樣。為了為本地區爭取最大的利益，它們就在政治上因不同的問題而分分合合，直到一八五〇年代整個的西部地區才一分為二。西南與東南結合

20. 有關進步派史家對美國歷史發展的解釋，請參考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1968); 以及註 5 與註 6 所引各文。

21. William McDonald, *Jacksonian Democracy, 1829-1837* (New York, 1906), pp. 314-315.

形成養奴的南方，西北與東北結合形成自由的北方，南北的對立終於出現。但在此之前，各地區間並沒有固定的結合型態。不過，Turner 傾向於認為西部居民多為自耕的小農，多以借債度日；大西洋沿岸較老地區則多為地主或資本家，多為債主。在政治上，無論全國或東部各州內，都是東部先開發地區掌握政權。因此，無論就政治、經濟或社會言，西部都是被壓迫的區域。但隨着人口的增加與覺醒，西部不甘受壓迫，於是區間的競爭遂不可免。所以，Turner 說：「我們可以將資本家與民主拓荒者之間的衝突一直追溯到最初的殖民時期」。²² Turner 即以此區間的分合競爭來解釋美國早期的歷史發展，當然也包括傑克遜時代。

Turner 指出，在一八二八年的選舉中，東南地區，大西洋中區與西部這一廣大的農業區聯合起來共同打敗了大新英格蘭 (the Greater New England) 與支持 Henry Clay 的肯特基 (Kentucky)，而使傑克遜當選為總統。但在此暫時的聯合中，毫無疑問的 Turner 認為孤立的西部力量超過人口較為集中與較為富有的中部與南部沿海農業區。換言之，使傑克遜當選的主要力量來自西部。而西部邊疆所孕育的民主又不同於東部較老地區的民主。由於這個原因，所以 Turner 說傑克遜的崛起代表兩個意義。其一是一個「農業社會」戰勝了「新英格蘭型的保守，工商業與製造業的社會」。另一種意義是「一個強調人權與個人主義，富有進取性與擴張性的新民主，不同於重視既得利益與共同行動 (corporate action) 的舊秩序 (established order)，取得了控制地位」。²³由這兩種意義看起來，Turner 雖然一再強調西部邊地人民之所以支持傑克遜是因為他具體表現了他們的民主理想、希望與意願，²⁴ 但是東西之間的競爭還是含有農業與商業，既得利益與新興利益之間經濟對立的因素的。

如果 Turner 在他的區域論中沒有明確的指出區域衝突也就是經濟利益衝突的話，其他的進步史學家却並不像他那樣的謹慎。他們把區域論與階級觀念結合在一起，直接了當的宣稱東西區間衝突，也就是小農對大資本家的階級衝突。因此，對 Beard 而言，傑克遜時代的政爭基本上是經濟之爭，只不過偶取區域之爭的形式而已。他接受 Turner 的區域論，而認為在十九世紀前期美國形成三個明顯不同的大區域，此即資本主義的東北地區，莊園生產（他用的字是 Planting）的南方與自耕農生產（他用的字是

22.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收在其本人的論文集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20) 中, p. 325. 有關他的區域論的詳情, 請參考 Ray Allen Billington, ed., *Frontier and Section: 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Englewood Cliffs, N.J., 1961); 以及 Turner, *The Rise of The West, 1819-1829* (New York, 1906) 與 *The United States, 1830-1850* 各書。

23. Turner 有關傑克遜民主的討論主要在其所著 *The United States, 1830-1850*, 第二章與第九章, pp. 14-38, 379-452. 此處所述取自 pp. 29-30.

24. *Ibid.*, p. 28.

farming) 的西部。另外在城市中還有一些手藝工人出現。自從一八二〇年代起，政權逐漸從東部沿海地區的資本家與莊園主手中轉移到邊地小農與城市工人手中。到一八二八年時，傑克遜終能領導邊地小農與城市工人等這些「社會的貧賤份子」推翻工商資本家與莊園主這些「有錢階級 (the monied classes)」而掌握了政權。所以傑克遜的得勢不僅是社會的下層階級打破了上層有錢階級對美國政權的長期把持，而且由於貧下階級的勝利更使美國的民主與平等向前推進一步。²⁵ 另一位進步史學家 Parrington 完全同意 Beard 的看法。他指出自從傑佛遜於十八世紀之末組織政黨開始，工業化就在不斷的製造城市中的無產階級，而西部邊疆則在生產貧窮的邊地居民。他們很早就已在階級情感 (class-feeling) 的驅策下反對上層階級所享有的傳統特權。但是直到一八二八年時，他們才在傑克遜身上發現實現他們期望的最好機會，因而大力支持他對「貴族的東部 (the aristocratic east)」的鬭爭。因此，對 Parrington 而言，傑克遜民主也同樣是城市工人與邊地窮農這些社會「賤民 (the rabble)」戰勝東部上層有錢階級的結果。²⁶

Beard 與 Parrington 雖然都以城市中的工人與西部邊地小農聯合起來對抗東部的上層有錢階級來解釋傑克遜民主的崛起與意義，但是在這個農工聯合中他們所重視的顯然是西部邊地的農民，所以在他們的解釋中，農民重於工人，地區衝突的意義大於階級衝突的意義。這一解釋到 Arthur M. Schlesinger, Jr.，時却被大大的修改了。Schlesinger 雖然繼承了他父親的看法，²⁷仍以工農的聯合對抗商業資本階級來解釋整個傑克遜民主運動，但是他的重點已不是西部邊地的小農，而是城市中的工人。Schlesinger 對美國歷史發展有一全盤的看法。他認為只要美國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 (liberal capitalist society) 繼續存在，傑佛遜與傑克遜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傳統雖會一時衰退，但永不會完全消失。美國的民主久已承認不同團體爭奪政權的控制是極為正當的事。事實上美國人認為這是自由的唯一基礎。「因為商界 (the business community) 常是各團體中最有力的，因此美國的自由主義通常是社會上其他團體企圖約束商界力量的運動

25. 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2 Vols., New York 1927), Vol. I, Chapter XII, "Jacksonian Democracy—the Triumphant Farmer-Labor Party," pp. 542-580. 此處所述主要根據 pp. 545, 551-552, 556-557, 571; 引文見 p. 557.

26. Vernon L. Parrington, *The Romantic Revolution in America, 1800-1860* (New York, 1927), Part III, "The Romance of the West," pp. 131-145, 特別是 pp. 138-140 尤為重要。又此書為 Parrington 巨著 *The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的第二冊。

27. Arthur M. Schlesinger, Sr., 也是一位進步派史學家，慣於以不同經濟利益集團的對立衝突解釋美國史事。關於他對傑克遜民主的看法，請參考他所著的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22), p. 209.

。」²⁸ 一八三〇年代的政治鬭爭只是此一「其他團體」與「商界」長期爭權的另一回合而已。只不過這次暫時成功的約束了商界力量的團體是工人與小農。如果僅就此而論，他對傑克遜民主的解釋並無新奇之處。他與前人如Beard與Parrington不同之處是他認為傑克遜民主的階級意味大於地區意味。他指出「如果將之視為一個階級問題而不是一個區域問題」，則我們對傑克遜民主「可能了解的更多」。²⁹ 不僅如此，他也一再強調傑克遜民主的許多主要信仰與動機都來自「東部與南方，而非西部」，³⁰ 以及東部是傑克遜激進主義的源泉。³¹ 而此激進主義的源泉不用說是由東部，特別是東北部城市工人所提供的。因此，綜合而言，Schlesinger 認為傑克遜民主是由東部城市工人所領導，反抗商業資本家控制權力的一次富有階級意義的運動。

Schlesinger 有關傑克遜民主的研究，*The Age of Jackson*，在一九四五年一出版就立刻引起廣泛的注意。此書除為他贏得普立茲獎之外，並重新恢復學者們對傑克遜時代的研究興趣。³² 對於Schlesinger 本人而言，此書自是一大成就；但對整個進步史學派對傑克遜民主的解釋而言，此書卻代表着進步派解釋主宰地位的結束。在過去的四十餘年之中，從Turner 到 Schlesinger，不管他們是以西部對東部，或以工農聯合對富有階層，或以工人對商界；也不管他們強調其區域意義或階級意義，總之進步派的史家都是用兩個對立團體之間的衝突來說明傑克遜民主的崛起與意義。這一看法不但與他們用來解釋美國整個歷史發展的衝突進步論完全一致，而且也清楚明白的反映了進步運動時期的流行偏見。因此，歷史解釋與時代流行思潮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於此又得一證明。但正因為如此，當流行的思潮變了，史學解釋亦必隨之而變。而當 Schlesinger 出版他的大著時，美國的一般思潮已開始趨向保守。隨着保守主義的增強，進步派史學對傑克遜民主的解釋先則成為批評的對象，繼則為其他解釋所取代。

(四)新保守派史家的解釋

進步派的史家將民主與傑克遜聯在一起，來表示一八三〇與一八四〇年代美國的特徵。在進步改革風潮盛行期間，無人批評此一聯用不當。但到一九五〇年代，雖然仍有史學家沿用「傑克遜民主」此一名詞，至少有一位史家對於這個觀念的適當性表示了懷疑。他認為這個名詞不但與事實不相應，而且會產生誤導作用，妨碍對那個時代的真正

28.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Boston, 1945), p. 505.

29. *Ibid.*, p. 263.

30. *Ibid.*, "Forward", p.x.

31. *Ibid.*, p. 209.

32. 據 Sellers 的說法，進步史學家有關傑克遜民主的區域衝突解釋因一再重覆，使史學家漸失興趣，直到 Schlesinger 出版他的研究之後，學者對傑克遜時代的研究興趣才再度恢復。參考 Charles Sellers, ed., *Andrew Jackson: A Profile* (New York, 1971), "Introduction," p.x.

了解。³³這個懷疑不是孤立偶發的現象。它事實上象徵着有關傑克遜時代歷史解釋演變過程中一個新學派的崛起與流行。

這個新史學派便是新保守史學派或諧和史學派(the Neo-conservative或Consensus historiography)。一位對傑克遜民主史學史有研究的學者曾說Schlesinger 的傑克遜時代觸發了其後有關傑克遜民主史學解釋的新修正主義。³⁴但是新保守史學崛起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瀰漫美國思想與輿論的保守風氣。在這種濃厚的保守風氣中成長的新保守史家對改革進步，原則高調，對立衝突都喪失了興趣。為了為當前社會的諧和一致尋求歷史基礎，³⁵他們既否認美國過去有明顯的階級衝突、地區對立或意識型態(ideology)之爭，更不承認美國歷史是經由一連串革命性的突變所造成的。他們強調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文化傳統以及革命理想使主要為中產階級構成的美國社會從一開始就共同接受一套基本的制度，價值體系與理想。因此，暫時的小衝突或有不免，但無可彌縫的根本區分對立卻並不存在。總之，他們在美國歷史上只看到意見與價值的諧和一致。這是他們有時被稱為「諧和史家」的原因。他們用此諧和的觀念來解釋美國的獨立革命，制憲運動，內戰前的改革運動，民粹運動(the Populist Movement)，運步運動，甚至內戰的發生。他們當然也不會忘記重新解釋傑克遜民主運動。³⁶

新保守史家雖然都一致同意傑克遜民主並不代表任何的原則或意識型態之爭，或階級的對立，但是在傑克遜當政這件事所蘊含的意義方面，各家的看法卻很不相同。以下即舉其要者，略加說明。

1. 新興小企業追求解放論 (the entrepreneurial theory)

首先被新保守史家提出來修正進步派解釋的是傑克遜代表新興小企業要求從傳統束縛中解放以便利擴張的說法。鼓吹此一主張的主要史家有 Bray Hammond與Richard Hofstadter。

早在一九四七年，也就是 Schlesinger 出版他的大著後的第二年，諳熟中央銀行運作的 Hammond³⁷即為傑克遜與第二國家銀行 (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之爭，或即所謂的銀行戰爭 (the Bank War) 的解釋作了翻案文章。從中央銀行控制及穩定貨幣的功能的立場，他一反過去進步派史家的說法，大大讚揚第二國

33. Lee Benson, *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 (Princeton, 1961), pp. 331-335.

34. Alfred A. Cave, *Jacksonian Democracy and the Historians* (Westport, Conn., 1964), p. 54.

35. Dwight W. Hoover, "Some Comments on Recent United States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Quarterly*, XVII (Summer, 1965), 300.

36. 有關新保守史學派崛起的背景，共同的看法與對美國歷史解釋的重點，請參考註5及6所引各文。

37. Hammond 在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 Board 服務前後約二十年。

家銀行在健全美國通貨與信用供給上所作的努力，批評傑克遜及其支持者廢除這家銀行的盲目無知與對美國財政經濟造成的重大傷害。但是他們何以要消滅這樣一個有益的金融機構？Hammond 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由一個企圖發財的人所構成的社會不能再忍耐一些舊有的傳統加之於企業發展的束縛。十九世紀初年工業發展所提供的無限機會使生長於農村的人逐漸發現只要有公平的機會，任何人都可用自己的努力致富。他們雖然仍是單純的美國人，雖然仍然叫着往日的農民理想(agrarianism)，但是他們的胸中卻早已充滿了發財的夢想與企業精神。他們也許比保守份子更易受財富利潤的吸引，對人權却更不關心。他們急於取得資本，擴張事業，因此憎恨第二國家銀行加之於各州銀行發行政策的束縛，他們遂決心支持傑克遜消滅這個「怪物」。所以，究其實，傑克遜對國家銀行的鬭爭是開始興起的小企業家對大資本家之爭，是銀行家對聯邦控制管理之爭，是紐約華爾街與菲城栗樹街 (Chestnut Street, 第二國家銀行總部所在地) 搶美國金融中心地位之爭。因此，傑克遜最後廢除國家銀行對資本主義或財產權或「錢權」(money power) 根本都毫無影響。它只不過是一夥人數較多的新興資本家給另一夥較老的資本家的打擊，只不過是商業民主化，企業擴散於眾，以及經濟主宰地位由一舊有的保守商人階級 (merchant class) 轉移到一較新、較富進取心與人數較多的商人 (business men) 集團的副產品而已。對於均貧富而言，這次銀行戰爭的效果可說適得其反，因為它使貧窮的農民還像以前一樣的窮，但卻使原來有錢的人更加有錢。³⁸ 總而言之，對 Hammond 而言，傑克遜與第二國家銀行之爭實是成千上萬急於致富成功的美國人企圖鬆解原有較為保守的銀行信用制度，使之更能適應希望發快財的普遍需求而已，根本沒有涉及任何理論，原則或意識型態之爭，也不含有被剝削壓迫的貧窮階級反抗富有的統治階級的意義。如果有對立的話，它無寧是新興的企業精神或發財的美夢與舊有制度的束縛之間的矛盾。

這種新興小企業家要求解放論也正是 Hofstadter 用來解釋傑克遜民主的主旨。差不多與 Hammond 首倡其理論的同時，Hofstadter 就已呼籲史學家從強調美國的普遍思潮來重新解釋美國的政治傳統。他覺得過去史家着重政治衝突的看法嚴重的扭曲了美國歷史的真象。他指出美國人早已普遍的接受了私有財產權，經濟的個人主義，以及自由競爭的價值。美國人認為資本主義文化的經濟道德是人們必須具有的素質。換言之，Hofstadter 相信美國文化的特徵是強烈的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在這個共同信仰的

38. Hammond 的解釋最初見於他的 "Jackson, Biddle and 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II (May, 1947), 1-23, 但是較為詳細的申述却是在他有關美國銀行史的大著中: *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 J., 1957), Chapters 12-16, pp. 326-548. 文中所述主要為根據上列第一文的 pp. 9-10, 與第二書的 pp. 328-329.

基礎之上，美國人在特殊的問題上雖亦時有爭執，但 Hofstadter 堅信這些爭執都是暫時表面的，不足以動搖基本價值與信仰的一致諧和性。³⁹

從這一普遍思潮來看傑克遜的民主，Hofstadter 發現完全與前不同的意義。他指出傑克遜的得勢不僅是政治民主擴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解放的資本主義（the liberated capitalism）擴張中的一個階段。但是不管前者或後者，都與小資本家的野心有着密切的關係。Hofstadter 指出美國東部製造業的發展與西部邊地的開拓定居都大大鼓舞了美國人的企業精神。在一八三〇年代，一個標準的美國人是一個充滿希望的資本家（an expectant capitalist）。他勤於工作，充滿野心與企業精神，發現處處都鼓勵他擴張他的事業。這一代充滿企業衝動的美國人對自己爭勝的能力都深具信心，他們確信只要給予自由平等的競爭機會，就必能出人頭地，迅速的致富成功。他們對足以限制自由競爭，妨碍迅速致富的特權，特別是由政府授權所建立起來的特權壟斷如第二國家銀行，都感到深惡痛絕，誓非打倒不可。因此，他們就在傑克遜的領導之下，進行對既得特權的攻擊。所以，Hofstadter 說傑克遜的民主起源於擴大的機會，以及希望透過消滅特權所造成的壟斷束縛來繼續擴大這些機會的普遍欲望。在基本上，這是一個自由放任主義的運動，其目的是要切斷商業與政府的關係，將政府的任務只限於平等的保護公民，使他們能夠公平的競爭而已。傑克遜民主不是在扼殺商業，而是將之解放，是要為人民的企業精神開啓所有途徑。而支持這個運動的人則是那些急於利用新經濟機會擴張事業，迅速致富的新興小企業家。⁴⁰在這個解釋裏雖然有新興小企業家要打倒特權束縛，但是這種對立衝突顯然沒有階級的或意識型態的含義在內，因為Hofstadter已將特權非人化了。他將之解釋為政府立法所造成的。同時，Hofstadter 也強調新的企業精神是一普遍現象，不限於任一地區或階級。所以，在 Hofstadter 的解釋裏如果有衝突存在的話，這種衝突也是存在於美國人普遍的野心與政府立法所建立起來的傳統特權，而不是存在於對立的階級或地區之間。

由以上分析可知，Hammond 與 Hofstadter 所討論的範圍實際上並不一致。Hofstadter 是以整個傑克遜民主為討論對象，Hammond 的討論則只限於這整個運動中的一特殊事件——銀行戰爭。而兩人的解釋在細節上也有差異。如 Hammond 認為消滅國家銀行的目的在除去國家銀行對各私家銀行自由發行銀行券（紙幣）的束縛，而 Hofstadter 則強調打倒國家銀行只不過是傑克遜與其支持者企圖消除一切傳統特權壟斷的象徵而已。雖然有這些範圍與細節上的不同，Hammond 與 Hofstadter 的看法有其基本上的共同之處。他們兩人都從新一代的美國人急於突破舊有限制與束縛以便發

39.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1948), pp. vii-viii, and x.

40. Hofstadter 有關傑克遜民主的討論主要在 *ibid.*, Chapter III, pp. 45-67. 文中所述係根據 pp. 56-62.

大財發快財的企業心與貪利心來解釋傑克遜運動或銀行戰爭的意義。他們既沒有特別強調其民主的含義，更不承認其與階級衝突、地區對立或意識型態之爭有任何的關係。這種解釋與進步派史家的看法自是大異其趣的。

由 Hammond 與 Hofstadter 首倡的企業解放論對於後來的史家頗有影響。如 Louis Hartz 在他研究美國自由傳統的形成與發展的著作中就力讚 Hammond 見解的正確，並將之溶入他自己的理論中。他指出在傑克遜時代民主與惠格兩大黨幾乎完全沒有異議的接受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當時美國既無勞資衝突，也沒有商業與其餘社會的對立。民主黨之得勢只不過是因為向上爬的美國人（men on the make）想打破固有的束縛利用新經濟機會發財而已。⁴¹而 Lee Benson 的種族文化論也是建立在 Hofstadter 與 Hartz 所提出的基本理論之上的。⁴²其他如 Arthur M. Thompson 在他有關佛羅里達(Florida)傑克遜民主的研究，以及 Walter Hugins 在他有關紐約工人運動的著作中都特別強調支持傑克遜的人大多是富有企業精神正在發跡中的年輕人，他們企圖消滅一切特權壟斷，決心擴大經濟與政治機會的基礎。這些觀念與 Hofstadter 與 Hammond 的企業要求解放論是頗為近似的。⁴³因此，這一企業要求解放論在傑克遜民主史學研究中實佔一席重要地位。

2. 種族文化論 (the ethnocultural theory)

企業要求解放論雖然首先突破進步派史家對傑克遜民主所作解釋的窠臼，但卻不能壟斷整個有關傑克遜民主的史學研究，因為另有其他的解釋出現，與之爭勝。其中之一便是種族文化論。持此看法的學者企圖從不同種族與宗教信仰所產生的文化差異來解釋美國選民的政治行為。他們並不否認美國歷史上有衝突存在，但卻認為造成這些衝突的根本原因不是社會經濟的區分，而是因種族與宗教不同所產生的文化差異。所以這一解釋顯然也是針對進步史學階級對立論而提出的。而就其不重視經濟區分與階級衝突而言，它應屬新保守史派的一支。⁴⁴

種族文化論的首倡者為 Samuel P. Hays 與 Lee Benson。自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七年之間，Hays 先後發表了四篇論文呼籲史學家從社會觀點重新研究美國的政治史。在

41. Louis Hartz.,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55), p. 138.

42. 請參考下文有關 Lee Benson 所提解釋的討論。

43. Arthur M. Thompson, *Jacksonian Democracy on the Florida Frontier* (Gainesville, 1961); Walter Hugins, *Jacksonian Democracy and the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the New York Workingmen's Movement, 1829-1837* (Stanford, 1960).

44. Richard L. McCormick, "Ethno-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9, No. 2 (June, 1974), pp. 352-353, 即作此認定。

所舉的具體實例中，他敦促研究美國政治史的學者應試圖了解美國選民的種族來源與宗教信仰如何決定他們對問題的看法以及如何影響他們的投票行為。⁴⁵在此呼籲之後 Benson 緊跟着於一九六一年出版了他引起廣泛注意與不休爭論的實證研究 *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⁴⁶ 給 Hays 一實際的響應。Benson 因此與 Hays 併為此一理論的創始人。⁴⁷

由於美國種族的多元化與社會的高度流動，Benson 因此堅信美國人比較更傾向於保持他們在種族團體與宗教團體中的成員身份，他們因此受其所屬團體的影響也更大，社會經濟團體的成員身份及其影響都不能與之相比。為了證明這個看法的正確，他選擇了紐約州一八四四年的投票結果加以分析。根據他的分析結果，他對十九世紀美國選民的投票行為提出一個普遍的假說，此即至少從一八二〇年代起，當男成人投票逐漸普及以後，種族 (ethnic) 與宗教差異比較而言是造成政治差異最重要的原因。⁴⁸

基本上，Benson 同意 Hofstadter 與 Hartz 有關傑克遜時代美國主導思潮的看法，即美國大部份人民與當時兩大政黨都接受與支持政治民主與自由的資本主義。但兩大政黨的基本主張既無分別，則何以有人支持民主黨，有人支持惠格黨？為了解決這一問題，Benson 遂對一八四四年紐約州選民的投票結果與其種族宗教背景的關係作了詳細的分析。為了分析的便利，他將一八四〇年代的紐約州人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在一七九〇年時即已居住在紐約的人，他稱之為「本土人」 (natives)；另一類是在一七九〇年以後才移居美國的人，他稱之為「移民」 (immigrants)。每一大類之內又各有若干次級種族團體。依此種族區分來分析，他發現在一八四四年的選舉中，「移民」的投票趨向兩極化，「新不列顛人」 (New British, 包括信基督教的愛爾蘭人、威爾斯人、蘇格蘭人與英格蘭人) 支持惠格黨，而「新非不列顛人」 (New Non-British, 包括信舊教的愛爾蘭人、日爾曼人、法國人與加拿大法國人) 則極大多數支持民主黨。在「本土人」中除少數的黑人與信新教的法國人 (the Huguenots) 外，其餘差不多平

45. Samuel P. Hays 的這四篇文章分別是：“History as Human Behavior,” in *Iowa Journal of History*, Vol. 58 (July, 1960), pp. 193-206;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 in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 Vol. 55 (Oct., 1964), pp. 157-169;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Community-Society Continuum,” in William Nisbet Chambers and Walter Dean Burnham, eds.,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1967), pp. 152-181; 與 “The Social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1880-1920,”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0 (Sept., 1965), pp. 373-394.

46. (Princeton, N.J., 1961).

47. McCormick, “Ethno-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9, No. 2 (June, 1974), p. 355.

48. Benson, *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p. 165.

均分配於兩黨，民主黨稍勝一籌。⁴⁹

以宗教信仰而言，Benson 估計約百分之九十五的舊教徒支持民主黨，但在此一宗教團體中歸化的舊教徒比土生土長的舊教徒更傾向於支持民主黨。至於在新教徒中正式的派別歸屬 (fomal sectarian affiliations) 則並不構成有意義的政治區分基礎。但是若干新教派中有關教義的爭執對於各自信徒的投票行為卻甚有影響，如「自由思想派」(the Free-thinkers) 的信徒多支持民主黨，而堅守傳統教義的人或正統派則傾向支持惠格黨。又清教徒比較偏愛惠格黨，而非清教徒則偏向民主黨。

總而言之，Benson 發現選民的種族文化與宗教的背景與他們的投票行為之間有所關聯。但是種族文化與宗教信仰如何會影響個人的投票行為？Benson 認為決定選民支持那一黨的考慮大致有三個：即為求達成個人或團體追求的政治目標，為求完成個人或團體的政治角色，以及對參照羣或個人的逆反應 (negative reference group or individual)。Benson 並不否認在這些考慮中有地方性的變化，如不同的地方傳統，地方經濟狀況以及地方的領袖等因素，但他卻特別強調種族文化與宗教信仰的重要，即這些不同的種族與宗教文化透過以上的三個考慮而決定選民的投票行為。

Benson 強調種族文化與宗教文化在個人政治行為上的重要性使他根本無法同意進步派史家的經濟決定論。因此，他曾屢次直斥其不當。首先，在分析了兩大黨高、中層領袖的社會經濟背景之後，他指出紐約兩黨的領袖都來自同一富有的階層。他也根據統計證據否認貧窮的農民與勞工支持民主黨，而較富有的農民、商人與製造業者支持惠格黨的說法。他說紐約州民主黨的主要力量根本不是農民與工人，而是東部諸郡中較高社會經濟階層以及散佈在全州各郡的一些種族文化與宗教集團。所以無論就領袖或支持者而言，民主與惠格兩黨都缺乏階級基礎或經濟意義。不僅如此，即在政綱與在州議會的立法方面言，民主黨不但沒有致力於發展州政府積極自由的運作功能以達到人人平等的目標，反而堅決反對政府積極的發展政治與經濟的平等以及推行社會與人道主義的改革。這些倒反而正是惠格黨所追求的。所以，進步史學家以為民主黨代表貧下階級與改革進步，惠格黨代表富有階級與保守主義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由於這些發現，Benson 直接了當的表示他完全不能接受 Turner 與 Beard 對美國政治史所作的經濟決定論的解釋。⁵⁰

自從 Hays 與 Benson 相繼倡導之後，種族文化論頗引起學者們的注意。他們或從理論與方法論上探討其優點與缺點，或用之於史事的分析，以說明美國選民的投票行為或政黨重組。但是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 一八五〇 年代與 一八九〇 年代的政黨

49. *Ibid.*, p. 290.

50. 文中所述為根據 *Ibid.*, Chapters VIII, IX, XIII, XIV and XV. 但 pp. 179-181, 185, 176, 187, 199, 207, 290, 292, 331-332 尤值得注意。

史。⁵¹ 只有 Benson 的高足 Ronald P. Formisano 與 William G. Shade 的研究涉及傑克遜時代。Formisano 用種族文化論來說明密西根州以羣衆為基礎的政黨的形成。他指出在一八三〇年代與一八五〇年代密西根的政治分合中，福音教派（the Evangelical denominations）的信徒，如土生土長的長老會信徒（Presbyterians），公理會信徒（Congregationalists）以及浸信會信徒（Baptists）大都支持惠格黨與後來的共和黨。他們特別關心人類的道德與社會幸福，因此他們比較傾向支持社會改革措施，並主張政府應積極採取行動以促進宗教信仰與道德的發展。民主黨的支持者則與之相反。大致上，他們都屬於反福音教義的教派，特別是愛爾蘭舊教徒，日爾曼路德派信徒與美以美教徒（Methodists）。他們反對福音教派信徒企圖使社會基督教化的努力，但卻贊成傳統的自由放任主義，平等主義，以及法律與道德的分離。因此，他說一八三〇年代與一八五〇年的政黨重組都是由宗教與種族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⁵² Shade 在對銀行存廢問題與舊西北五州——俄亥俄、印地安那、伊利諾、密西根與威斯康辛——政治關係的研究中也得到同樣的結論。他指出銀行問題在此舊西北地區同時具有「象徵的」與「真實的」兩種意義。他並不否認銀行的存廢影響到經濟體系內財富與資源的分配，但是他更強調此一問題也影響到當地種族宗教（ethnoreligious）團體的地位升降及其價值體系的盛衰。他利用大量量化證據與內容分析證明從東北與東中地區移來的新教徒，公理會信徒，英國國教會信徒都擁護銀行，他們的企業與道德價值使他們先後支持惠格黨與共和黨。自南方來的移民，愛爾蘭舊教徒，美以美教徒，以及日爾曼路德教徒為抗拒前一集團的主宰當地，以求保持他們原有的信仰與生活方式而支持惠格黨的敵黨——民主黨。所以在 Shade 看起來，舊西北地區選民對銀行問題的反應不是決定於狹義的經濟利益，而是決定於他們的文化傳統。因此，他總結謂「內戰以前舊西北諸州中有關銀行的爭執不能單純的被認為是富者（the haves）與貧者（the have-nots）之間的衝突，而必須被了解為構成該地區黨爭的各政治次文化（the political subcultures）之間衝突的一面。」⁵³ Shade 與 Formisano 所討論的問題雖然不同，但是他們解釋的重點竟是如此的相似。當然，他們也無虧為 Benson 的學生。

由於 Hays 與 Benson 的鼓吹，以及他們的學生的繼續努力，種族文化論者對十

51. McCormick, "Ethno-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9, No. 2 (June, 1794), 特別是 p. 352 上的 Notes 1 and 2.

52. Ronald P. Formisano, *The Birth of Mass Political Parties: Michigan, 1827-1861* (Princeton, N. J., 1971), 特別是 pp. 8, 102-103, 110, 126-127, 328-329 尤為重要。

53. William G. Shade, *Banks or no Banks: The Money Issue in Western Politics* (Detroit, 1972), 引文見 p. 18, 其餘見 pp. 174, 197, 253.

九世紀美國政治的解釋終於在美國政治史的研究中形成一個「新政治史」學派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這個學派之所以新，不僅是新政治史學者在研究中大量使用量化法。尤豈重要的是他們突破了進步派史學家的陳腔舊調，從一個新的觀點來看傑克遜時代的政治，而別有所見。大致言之，他們都接受 Hofstadter 與 Hartz 的看法，即十九世紀時極大部份的美國人都接受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但在此普遍的諧和之上仍時有政治爭執的發生。不過，這些爭執或衝突都是由選民的種族文化與宗教信仰的差異所造成的，與他們的經濟利益，意識型態或階級地位完全沒有關係。這種看法與新保守史學的基本主張幾無差異。至於在貢獻方面，雖然新政治史家在使用的方法與推論上不免有缺陷，⁵⁴ 但他們的研究卻也使決定選民投票行為的諸多因素中一項一直被忽略的因素受到應得的重視。僅就此而論，新政治史受到重視即已不足為異。

3. 政黨為選舉機器論

另一位新政治史家 Richard P. McCormick 則從分析政黨形成的過程與目標來否認傑克遜的當政具有任何經濟、階級或意識型態的意義。在一九五九年他即已經由分析北卡洛琳那州與紐約州的投票結果而得到結論謂選民的投票行為與其經濟地位毫無關係。⁵⁵ 次年在另一篇論文中他又否認傑克遜的得勢當政代表任何「強力的民主勃興」。他仔細分析比較了一八四〇年及其以前相關選舉的投票結果之後，發現如「強力的民主勃興」意指吸引前所未見衆多選民去投票的話，則傑克遜的參選沒有一次造成「強力的民主勃興」，因為他並沒有能夠吸引特別多的人去投票。實際上去投票的選民人數大量增加是一八四四年真正的兩黨政治在全國各州發展完成以後的事，其時傑克遜早已退休

54. 從方法論批評新政治史的頗不乏人。但因方法論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故不引論。除前面數次提到的 Richard L. McCormick 的論文外，請參考以下諸文：Frank Otto Gatell, "Money and Party in Jacksonian America: A Quantitative Look at New York City's Men of Qual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2, No. 2 (June, 1967), pp. 235-252; James E. Wright, "The Ethnocultural Model of Voting: A Behavior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in Allan G. Bogue, ed., *Emerging Theoretical Model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Beverly Hill, California, 1973), pp. 35-56; James Green, "Behavioralism and Class Analysis: A Method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Critique," *Labor History*, XIII (1972), 89-106; J. Morgan Kousser,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4, No. 1 (March, 1976), pp. 1-14; 以及 Richard B. Latner & Peter Levine, "Perspectives on Antebellum Piestic Politics," *ibid.*, pp. 15-24. Harry L. Watson, *Jacksonian Politics and Community Conflict: The Emergence of the Second Party System in Cumberland County, North Carolina* (Baton Rouge, 1981), "Introduction," pp. 1-16, 比較偏重批評解釋內容上的缺失。但最嚴厲的批評見 Sean Wilentz, "On Class and Politics in Jacksonian America," *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0, No. 4 (December, 1982), pp. 45-63, 特別是 pp. 47-51.

55. Richard P. McCormick, "Suffrage, Classes and Party Alignments: A Study in Voter Behavior,"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LVI (December, 1959), 397-410.

了。⁵⁶但是他的看法的最詳細完整的敘述卻是在他有關美國第二政黨體系 (the Second American Party System) 的研究中。在這本書裏，除了南卡洛琳那州外，他逐州分析了從一八二四到一八四〇年間各州政黨發展的情形。根據這些仔細的分析，他得到數點結論，其中要者有：①勢力相當的兩黨制度在各州發展與完成的時間並不一致，有的早有的晚，但到一八四〇年的選舉時各州都有勢力相當均衡的兩黨參選。因此，McCormick 宣稱從一八二四年美國第二政黨體系開始發展，但直到一八四〇年才正式完成。②第二美國政黨體系起源於三個因素：即由第一政黨體系所獲得的經驗；一八二四年以前法律與政治環境的改變使選民直接參政的機會與影響力大增，因此需要有組織的政黨動員選民投票；以及政黨領袖，他強調政黨既不是自動出現 (emerge) 也不是自然形成 (form)，而是由一些頭腦敏銳活力旺盛的政客領頭創造出來的 (created)。③以上三種因素雖都有助於政黨的形，但造成第二美國政黨體系的最主要力量卻是贏得總統選舉。他指出雖然政黨在既經形成之後即參與所有各級政府公職的競選，但是在各州第一個推動組織政黨的力量毫無例外的都是選舉總統的問題。所以，他說美國第二政黨體系主要是為了爭取總統寶座而形成的。這一體系的一切特徵都是因為各州的政治領袖將他們的行動密切配合總統選舉才具有的。總之，作者強調美國第二政黨體系不是源自國會內部的分裂，也不是來自在某些特殊公共問題上意見的兩極化或是有關主義的爭論，而是起源於一八二四年到一八四〇年間的各次總統選舉。任何一州只要與某位總統候選人產生認同，政黨就會出現，而政黨一旦形成之後，就會參與一切選舉，以取得政府職位。因此，在 McCormick 看起來，政黨形成、存在與繼續發展的唯一理由或目的就是為了參加競選，動員選民與爭取勝利。在基本上他認為「美國的政黨只是選舉機器 (electoral machines)，致力於提名與選舉候選人，而不像 Edmund Burke 所說的是『一組人結合在一起，根據他們同意的某一原則，共同致力於發展國家的利益。』」⁵⁷ McCormick 顯然不承認兩黨之爭涉及任何經濟、社會或原則上的差異。不同的政綱，競選言論與口號等正如羣衆大會，野餐會，遊行等活動一樣，全都不過是動員選民與爭取選票的手段而已，並無實質的意義。

但是，McCormick 這種將政黨視為選舉機器的看法似乎得不到地方性研究的支持。⁵⁸如 Herbert Ershkowitz 與 William G. Shade 在將紐罕普什爾，賓州，俄亥

56. Richard P. McCormick, "New Perspectives on Jacksonian Politic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 (Jan., 1960), 217-229.

57. Richard P. McCormick, *The Second American Party System*, 引文見 p. 4, 其餘見 pp. 13, 31, 342-353.

58. 據 Herbert Ershkowitz & William G. Shade, "Consensus or Conflict?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State Legislatures During the Jackson Er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58 (December, 1971), P. 592, Note 5, 的意見, Edward Pessen, *Jacksonian America: Society,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Homewood, Ill., 1969) 與 *Most Uncommon Jacksonians: The Radical Leaders of the Early Labor Movement* (Albany, New York, 1967) 同意選舉機器的主張。但 Pessen 的意見實際上並不如此單純，頗難如此認定。如他指出不均的財富分配、嚴格的階級區分、以及專為上層階級利益服務的城市政治等都顯示傑克遜時代的美國是一個很不平等的社會。這一看法使他頗像新左派史家。

俄，紐澤西，維琴尼亞與米蘇里五州的州議會自一八三四到一八四三年間在所有議案的表決中投票的結果作了量化分析之後，發現「選舉機器」的說法並不足以充分說明傑克遜時代政黨體系的特徵；⁵⁹而Harry L. Watson則根據他對此卡洛琳那州Cumberland郡政黨形成的研究所得，堅稱傑克遜時代政黨體系的出現涉及的因素非常複雜，包括地方上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對立爭執，以及領袖人物的恩怨，絕非單純的贏取總統寶座所能解釋得了。⁶⁰ Burton W. Folsom II 雖在基本上同意 McCormick 的主張，但他對舊南方政黨發展的研究卻也證明領袖人物個人間的恩怨對南方政黨的形成立定性的影響，而在北方與南方少數移民集中的地區，若干文化問題如移民投票權及禁酒等，以及一八三七年的經濟恐慌對一八四〇年的選舉所發生的影響超過政黨的競選組織拉票活動。⁶¹ 這些研究都顯示 McCormick 的基本觀念過份單純，不足以合理的說明美國第二政黨體系的形成與特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沒有指斥他的看法是根本錯誤的，而只是不足 (inadequate) 而已。當然他們更沒有因 McCormick 理論之不足而另以自由與保守，貧與富的簡單兩分法來說明民主與惠格兩黨的差異。單就此點而論，他們也是與進步派史家大不相同的。

總之，McCormick 因為是從制度的觀點來分析美國第二政黨體系的形成，所以只注意到政黨結構，競選組織與憲法環境，並沒有特意去探究選民的投票動機，政黨的社會成份或意識型態等問題。但是他既然認為政黨唯一的功能在提名候選人並使之當選，是政客們利用的選舉機器，是一個雜湊的聯合 (coalition)，他當然也就不能承認政黨可能代表任何可以確認的意識型態、原則、階級或經濟利益。事實上，他的選舉機器論正暗示美國人在基本利益，價值與信仰上的諧和一致，否則政黨豈能不反應這方面的爭執？因此，就他所反對與贊成的而論，McCormick應是新保守史學派的一員。至於其他研究第二政黨體系的學者雖多不能同意他的見解，但他們所作的也不過是以多元因素代替他的單一因素而已。多元因素的說明自然與進步派史學的經濟決定論也是大異其趣的。

4. 心理學的解釋

以上所述新保守派諸家都從實質的問題——不管是小企業尋求解放，或種族文化的作用，或爭取總統寶座——來解釋傑克遜民主運動的意義，但另有至少兩位學者卻別開蹊徑，在人們因社會經濟變遷所產生的焦慮不安中尋求傑克遜號召力的根源。John W.

59. *Ibid.*, pp. 591-621.

60. Watson, *Jacksonian Politics and Community Conflict*.

61. Burton W. Folsom II, "Party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Jacksonian America: The Old South,"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II (1973), 217-229.

Ward 在可能是有關傑克遜象徵意義的唯一研究中指出對他那時代的美國人而言傑克遜是一個農業理想 (an agrarian ideal) 的具體化身。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質樸、反智、富於直覺的個人。他輕視正式的教育與訓練，對於易使人弱化的歐洲文明更加瞧不起。他堅決的相信命運操在自己手中，堅強的意志 (will) 是成功之母。他也確信上帝在照顧美國人並授給他們一個神聖的使命。作者將此理想的美國人所具有的特徵歸納為三個基本觀念：即自然 (nature)、意志 (will) 與神祐 (providence)。當時的美國人將他們所崇尚的這三個觀念投射到傑克遜的身上，而使傑克遜轉變為體現他們理想的民族英雄。雖然實質的傑克遜 (the real Jackson) 與象徵的傑克遜 (the symbolic Jackson) 並不一樣，但是並不重要，甚至實質的傑克遜這個人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根據理想所塑造的那個像或象徵的傑克遜。所以在 Ward 看起來，選民投票給傑克遜，並不是支持那個實質的人而是他所象徵的那三個理想的觀念。他指出由崇尚自然、意志與神祐所孕育出來的強烈個人主義完全符合當時富進取求發展的時代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他認為傑克遜的號召力 (appeal) 也是反動的。他說人民所塑造的那個象徵的傑克遜一方面排斥原始的蠻荒自然，另一方面拒絕進步的文明。這種愛惡混淆的態度只有在美國還有邊疆可以開拓時才能維持，因為美國文明可以不斷的在邊疆開拓中重新接觸自然而重生復振。而且在美國的理想中，自然與文明的調和是靜止的，只有在拓荒階段，亦即只有在荒野已被開闢但文明尚未進步到足以使人弱化的階段才能達到與維持。可是，邊疆正在逐漸消失，美國的文明正在不斷進步。美國離自然日遠，進入文明日深。不但自然與文明不能再調和並存，即理想與現實也相去日遠。這種失調以及美國人仍執着過去的理想使他們在心理上難以順利的適應新現狀。這一調適的困難造成內心的焦慮不安。⁶² 因此，美國人塑造了一個象徵性的傑克遜而給以熱烈的支持實際上只是為了重新肯定由邊疆農業生活所孕育出來的理想，以消除其內心的焦慮不安而已。⁶³

從塑造「神話 (myth)」以宣洩內心焦慮不安的角度來解釋傑克遜民主的另一位史學家是 Marvin Meyers，只不過 Meyers 比 Ward 更注意當時美國人舊理想與發財欲的矛盾。

確信只注意政客的腳而不注意他們的嘴並不足以了解一個時代的政治意義，⁶⁴ 因此

62. John William Ward, *Andrew Jackson: Symbol for an Age* (New York, 1953), pp. 207-213, 45 尤為重要。

63. Cave, *Jacksonian Democracy and the Historians*, p. 74.

64. 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Politics and Belief* (Stanford, 1957), 本文所用為一九六〇年版，在此版的前言中，Meyers 引用了一則肯塔基的老諺語：如果你想知道政客的意圖，注意他的腳，不要注意他的嘴。見 p. v.

，他對當時政黨領袖與輿論領袖的言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以確定傑克遜時代羣衆的政治信念 (persuasion) 是甚麼。結果他發現這一信念充滿矛盾也混淆不清。這種情形的造成主要是由於支持傑克遜的人的內心矛盾：他們希望保持舊有的那種單純農業共和的價值，卻又不願放棄近代資本主義的利益與便利。何以會造成這種情形？Meyers 解釋說由於十九世紀之初工商業的發展，到一八三〇年代美國已開始走上工商資本經濟的路線，經濟蓬勃發展，到處都是發財的新機會，每個人都急於利用新機會發財致富。但是這新興的工商資本經濟卻充滿了危險，詭變，投機與貪慾。美國人對這種新經濟秩序與生活方式在心理上難以適應，因為在習慣上他們還仍固守過去那種單純質樸安定舒緩的農業社會生活方式。因此，他們在心理上產生矛盾與不安——經濟利益誘使他們前進，傳統的理想與價值卻在扯他們的後腿。Meyers 稱這種人爲「冒險的保守份子」(adventurous conservatives)。傑克遜主張打倒資本大亨的壟斷，消滅特權，提供自由平等的競爭機會——換言之，恢復傑佛遜式農業共和 (Jeffersonian agrarian republic) 的號召恰好給予這種人逃避心理矛盾不安的機會，因此他們就紛紛支持他。但是並非所有的美國人都感到這種心理上的矛盾不安。有些美國人根本不理會過去的理想與價值體系，而全心全意的投身到這新經濟潮流中去發財致富。由於惠格黨的主張訴諸於對未來的希望，所以這些人都成爲惠格黨的支持者。在這一解釋裏，民主黨代表保守甚至反動的力量，而惠格黨則代表改革與進步的要求。

Meyers 所企圖作的是爲傑克遜的政治號召力 (political appeal) 尋求心理基礎。結果他發現，那是「恐懼與希望、熱情 (Passions) 與信仰」在支持當時選民對政黨的效忠。這其實也正是 Ward 所主張的。因此，這兩位史學家在研究主題上雖有不同，但他們所使用的方法與所得到的結論在基本上卻是相同的。他們都是從舒解內心矛盾焦慮的觀點來說明傑克遜的主張對某些選民有號召力的原因。這種心理學的解釋自然是容不下社會經濟二分對立的。正如 John Higham 所說的，心理解釋是消除階級對立與經濟衝突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因為它可以將外在的衝突轉化爲普遍的個人內在的矛盾與緊張。⁶⁵所以，在 Meyers 與 Ward 的解釋裏沒有貧與富，保守與進步的對立；有的只是大部份美國人都在爲自己的內心平靜作打算。他們顯然與以上所討論的新保守史學屬於同類。

對傑克遜民主史學史有過涉獵的人大都認爲小 Schlesinger 的傑克遜時代是總結進步派史學家對此運動研究成果之作，同時觸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關傑克遜民主的新研究興趣，因爲這些新研究都是直接或間接的針對小 Schlesinger 而作。不過，從戰後學者們對小 Schlesinger 的反應不是完全否定他的解釋，就是大加修正看起來，戰後

65. Higham, *History*, p. 230.

學者們有關傑克遜民主的新看法之崛起絕非僅是由於小 Schlesinger 一種影響而已。這種對進步派史學全面的否定或大事修正事實上是時代流行思潮趨向保守的結果。小 Schlesinger 不過因為出書的時機，適巧成為新保守史家攻擊進步派史學的代罪羔羊而已。

因為種種原因，羅斯福總統所領導的「新政」(New Deal) 改革隨着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結束，保守的風氣漸興，自戰後直到今天，除六〇年代中後期之外，美國始終籠罩在一片濃濃不散的保守氣氛中。在此氣氛中孕育成長的史學家們與孕育成長於改革激情中的前輩們自有其不同的經驗，不同的心態與不同的觀點。這些差異必然會影響他們對傑克遜民主的看法。至少自 Hofstadter 開始，在近四十年中，研究傑克遜民主的學者們意見仍甚為紛歧。在這個運動的起源、意義與貢獻等問題上，學者們仍不能達到任何的「共識」，有的認為它代表新興企業企求解放的努力；有的認為它反映了當時美國種族文化與宗教信仰的分合；有的認為當時的兩黨只是政客贏得官位的工具，因此傑克遜民主不具任何實質的意義；有的則認為選民支持民主黨只為了緩和其內心的矛盾不安。這些解釋在細節上顯然各有不同。但是這些解釋卻有一基本相同之處。最近四十年來的史學家大都假定一八三〇與一八四〇年代的美國在價值體系、意識型態或經濟利益上是和諧一致的，所以社會上並無重大根本的衝突對立。但是，在此普遍諧和的基礎之上，小的表面爭執仍時有發生。不過即使如此，他們也不承認這些爭執是由經濟利益或階級區分所造成的，而另有其他原因，如 Hofstadter 與 Hammond 認為那是個人追求成功的欲望與舊秩序的束縛力量之爭；Benson 與其同志則認為那是因為不同種族與宗教信仰所產生的文化差異決定選民支持民主黨或惠格黨；Ward 與 Meyers 認為支持傑克遜的選民是深受內心煎熬的人。至於對 McCormick 而言，選民投那一黨的票毫無社會經濟意義，因為他們的投票只是政客用競選花招動員爭取的結果。所以，不論這些史家們在細節上意見如何不同，他們共有的特點是他們都沒有用經濟利益團體或階級之間的衝突來說明傑克遜民主的產生；也沒有以民主黨代表民主進步，惠格黨代表貴族政治與保守來說明傑克遜民主的意義。對他們而言，「傑克遜民主」的確是一個不恰當的名辭。他們顯然背叛了他們進步派的前輩們，而與其他大部份的同輩史學家們共同反映了他們所處時代流行的保守風潮。因此，他們也是時代產物。

(五)新左派史家的解釋

一九六七年時，Irvin Unger 發現美國史學界出現一批年輕的史學家，以憤怒的言辭與馬克斯的理論表達了他們對美國歷史的新看法。他們因此被稱為「新左派史學家」。

」(the New-left historians)。⁶⁶ 新左派史學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崛起的爭自由、爭平等、反越戰，反飢餓的激進改革運動的一部份。曾經親身參與這一運動的許多年輕學者既感於需從歷史上證明美國的過去與當前都並不如諧和史家所說的那樣充滿和諧與滿足，以打破當前的保守氣氛，又爲了爲他們的激進主義建立歷史基礎，他們於是轉而從事美國史的研究。他們也頗能領風騷於一時。不用說，這些年輕激進的史學家研究的範圍不一，看法各別。但在對美國歷史的解釋上，他們大致又恢復了進步派史學家的階級衝突論調，只不過在意識型態方面，他們受到馬克斯理論的影響更大更明顯。但是他們不是馬克斯教條的頑固信徒。他們只是借用了馬克斯的若干觀念而活用到美國歷史的解釋上。所以在他們的著作中雖有階級區分與對立的影子，卻沒有僵化的經濟決定論。⁶⁷ 事實上，他們的解釋有時與進步派史家的看法難作明確的區分。新左派史家對傑克遜民主的解釋也正是如此。

在新左派史家中首先討論傑克遜民主的是 Michael A. Lebowitz。Hofstadter 與 Meyers 所描繪的傑克遜時代的美國人既進步又反動，這是一個矛盾(Paradox)。Lebowitz 的研究即試圖解開這個矛盾。他同意傑克遜時代是一個經濟發展，人民普遍上升的時代。但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從此經濟繁榮中獲利；農民、技匠(mechanics)與勞工中有些反而遭受到傷害損失。如十九世紀初期的交通改善使西部與沿交通線附近地區的農民獲利，但是西部農民所生產較爲便宜的麥子卻也使一些地利漸耗、成本漸增、產量漸減的較老地區的農民遭受嚴重的打擊。這些由交通改善所造成的地區分工的犧牲者大都集中在新英格蘭以下到南方的東部沿海地區。但是因經濟改善而受損的人不只限於這些農民。此外還有散處全國各地的技匠與工人。如交通改善就可能使西部的技匠受到打擊，因爲原有交通不便帶給他們的保護隨東西交通發達而撤除，東部工廠生產的便宜貨輸入，他們無力與之競爭。但使技匠與勞工遭遇困難的原因尚不止此。新興商業資本家利用寬鬆的銀行貸款設立工廠，爲擴大的市場大量生產產品，生產成本降低，品質提高，這自非以手藝爲本地定單生產的技匠所能抗衡。傳統上頗受尊重頗能獨立自主的技匠們不是自己投資設廠，擠身商業資本家行列，就是喪失地位而成爲工廠中靠工資維生的工人。而一八三〇年代中期物價的大幅上揚更使這些下降的技匠與勞工在實質收入上大爲減少。這兩種工人在這新經濟變遷中，不但地位降低，連收入也大爲減少。這些遭受損害而衰落的技匠、勞工與農民的確有理由對現狀不滿。而他們認爲造成他們不幸與墮落的原因是人爲的特權，特別是那個第二國家銀行。他們堅信只有消滅這些特權

63. Unger, "The New Left and American History: Some Recent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II (July, 1967), 1237-1263.

67. 關於新左派崛起的背景與主要的主張，請參考注 5 與注 6 所列相關各論文，此處不另作詳論。

，恢復公平的競爭機會，他們才有希望。他們因此都支持傑克遜。⁶⁸Lebowitz 顯然認為民主黨的確代表「卑微之民」(the humble people)，而這些卑微之民之所以支持民主黨確實是因為他們在普遍的經濟發展中不但不能分享繁榮，反而遭受損失。他們不是遭受內心矛盾煎熬的人。據此而論，Lebowitz 雖沒有從純粹的馬克斯觀念來解釋傑克遜民主，也並沒有強調民主與惠格兩黨分別代表無產與資本階級，但他卻清楚明白的表示遭遇不幸的卑微之民——下降的農民、技匠與勞工——比較傾向於支持民主黨，顯然經濟利益決定他們的投票行為。這實際上也正是 Sean Wilentz 有關傑克遜時代階級與政治的關係的研究結論。⁶⁹

Lebowitz 提到的貧富兩極化現象在 Douglas T. Miller 對紐約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證明。他指出在傑克遜時代政治民主雖有進步，但社會與經濟的區分差異却越趨明顯。他說在內戰前的三十年中，運輸改善與工業革命逐漸破壞了十九世紀初年時美國相當一致的中產階級社會，並使之趨向兩極化。巨大財富集中在少數工商資本家手中，因此造成一個財閥貴族，與人民大眾日漸隔離。另一極端則是大量移民與工業化造成一個依靠工資渡日的勞工階級。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對照正如巨宅華廈與貧民窟並存於都市中同樣的現眼。⁷⁰雖然 Miller 本人並沒有討論到這兩個階級的政黨歸屬，但是他的研究却使 Lebowitz 的看法，更具說服力。

然而，Lebowitz 與 Miller 的意見，並未能成為傑克遜民主史學解釋的主流。新左派史家對傑克遜民主作深入系統研究的人也絕無僅有。這可能是因為新左派史學原本就是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激進抗議運動的副產品，既隨之而興，也必然隨之而衰。而這個激烈的改革運動並沒有能維持好久，隨着尼克遜在一九六八年的當選總統，新左派的運動即逐漸消聲匿跡，跟着就是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以後，保守風氣的長期統治。所以新左派史學正如新左派運動一樣，其興也疾，其衰也速。因為時間過短，還來不及充分發展，穩固學術基礎，它即已喪失了存在的理由。不管原因為何，事實是新左派史學對傑克遜民主的史學研究發生的影響極為有限，⁷¹至少他們並沒有能夠動搖新保守派史家的主宰地位。

68. Michael A. Lebowitz, "The Jacksonians: Paradox Lost?" in Barton J. Bernstein, ed., *Towards A New Past: Dissenting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69), pp. 65-89.

69. Wilentz, "On Class and Politics in Jacksonian America,"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0, No. 4 (December, 1982), pp. 45-63. 他認為民主與惠格黨都是自由主義的政黨，都由新的精英份子所領導，但惠格黨的支持者大都來自從變遷中的美國市場與階級關係獲利的人，民主黨的擁護者則都是因此關係的改變而受損的人。

70. Douglas T. Miller, *Jacksonian Aristocracy: Class and Democracy in New York, 1830-1860* (New York, 1967).

71. 至少在本文所能參考到的美國史學史家中無一人特別提到新左派史家對傑克遜民主的研究有何重大的影響或貢獻。

(六) 結 論

Wilentz 在一九八二年時曾說近來研究傑克遜時代政治史的興趣大減。學術刊物登載有關此一題目的論文從一九六九年最高峰的二十篇遞減到一九八〇年的四篇。⁷²最近五、六年的情形似乎也沒有多大改善，有關傑克遜民主的研究數量依然不多。但是在此之前卻並非如此。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傑克遜民主曾是史學家們激烈爭論的題目。而這些爭論都清楚的顯示傑克遜民主的意義隨時代思潮而變。

有關傑克遜時代的史學研究始於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業餘史家。但那時的史學家們都沒有對傑克遜的時代作過深入系統的專門研究，充其量他們只為傑克遜個人作傳或在他們有關美國全史的巨著中提到傑克遜而已。這些粗略的描述都還沒有將傑克遜視為民主鬥士。事實上，這些紳士型的業餘史家對傑克遜與他當政後的施政都難以全盤接受。雖然順應十九世紀後期的改革風潮，這些身為自由份子的史學家能同意傑克遜的少數措施，但基本上他們認為傑克遜是一個粗鄙無知的人，他的當政使美國的民主品質鄙俗化。史學家這種敵視的態度到下一個世紀開始之初完全轉變。當一批來自西北農村而在改革風潮中成長的專業史學家再來研究同一時代時，他們不但將傑克遜捧為民主的鬥士，而且把他的名字與美國民主的突進聯在一起。於是傑克遜領導社會中貧下階級戰勝了保守的富有階級，使美國的民主又向前大大的推進了一步的看法就成為進步派史家對傑克遜時代的典型解釋。因為這一解釋是進步運動的產物，所以它也隨着此一改革風氣的長期盛行而主宰傑克遜民主史學解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保守主義崛起，並長期左右美國思潮。其間雖曾有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新左派的激進改革運動，但卻未能長期突破保守氣氛的籠罩。這一保守風潮使戰後的新保守史家們在解釋傑克遜民主時都排斥他們前輩們的看法。大致言之，他們大都認為和諧一致是傑克遜時代美國的特徵，社會上根本沒有階級或經濟利益的對立衝突。傑克遜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對立不是假像，就是「神話」，或由其他非階級與非經濟的因素所造成的短暫浮面的衝突。就是那些仍承認民主與惠格兩黨相爭具有經濟或階級意義的學者如 Robert V. Remini 與 Daniel Feller 等人也不再用經濟決定論來解釋傑克遜民主的崛起與意義。⁷³不用說，否認階級

72. Wilentz, "On Class and Politics in Jacksonian America," in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0, No. 4 (December, 1982), p. 45 及 p. 46 的圖表。

73. Robert V. Remini 致力於傑克遜研究二十餘年，著作甚多，最重要的為三大冊的傑克遜傳：*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Empire, 1767-1821* (New York, 1977), *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Freedom, 1822-1832* (New York, 1981), 與 *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1833-1845* (New York, 1984)。二次世界大戰後研究傑克遜民主的史家中，Remini 在意見上是較為接近進步派史家的一位，但他却也沒有用經濟或階級對立這唯一的因素來解釋傑克遜民主的崛起或意義。又 Daniel Feller, *The Public Lands in Jacksonian Politics* (Madison, Wis., 1984)，雖討論的問題只限國有土地的處置，但却也同樣以多元因素來說明傑克遜時代的政黨形成。

衝突強調和諧一致完全符合最近四十年來籠罩美國思潮的新保守主義的需求。

所以，有關傑克遜民主的史學解釋之演變再次證明歷史解釋與時代思潮之間的密切關係。正因為這一關係，在時代思潮沒有重大而較持久的改變以前，對傑克遜民主的全新見解就難望出現。但是任何一種解釋在長期的一再重覆之後，都會走入死巷，了無新意。Wilentz 所稱近年來對傑克遜民主的研究興趣衰退，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對此問題研究興趣的復振，新見解的提出，都只有等待美國思潮的再改變了。

這篇論文在研究與撰寫期間，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得以順利完成，謹此誌謝！又李達嘉君協助蒐集資料，併此致謝！